

■综述

多元声音 美美与共

——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阅读印象

□邱婧



回首2017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有很多令人欣喜的文学事件发生,有众多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投身于文学创作,更有优秀的文学佳作和批评文章涌现。作为一位旁观者和文学丛林中的旅行者,我尽可能勾勒出自己的阅读视图,试图从个人的视角观察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场。

丛书出版热潮彰显民族文学丰富性

文学出版是展现文学创作活力的一个重要维度。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成果颇为丰富。首先要提及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这套丛书由专注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学者张锦贻主编,包括10部反映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情感生活的原创长篇文学。这些作品独具一格地分别以藏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景颇族、壮族、拉祜族、土家族和满族的儿童生活为创作背景,在艺术上体现了多样化的族群特性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之前已经出版了30卷,在2017年又继续出版了第31至40卷。丛书囊括了新疆当代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文学的发展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以本民族文字出版之时,在本民族读者中已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如铁来克·张宏超、古丽娜尔·吾甫尔、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哈依夏·塔巴热克等,积极投身于翻译之中,使这些作品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译作与原作的贴合。

双语文学丛书和少数民族母语丛书的出版越来越普遍。《文学翻译双语读本丛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套书精选了60多篇在《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发表过的优秀翻译作品,并与汉文原作一起出版,增强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与汉语文学之间的互动性。图书出版后入选“2017年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四川民族出版社联合编选了《藏族青年优秀诗人作品集》(十卷本),包括白玛央金、琼吉、蓝晓、王志国、唐闯、扎西才让、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德乾恒美、单增曲措等藏族诗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原本是使用汉语写成,而后由一批藏族译者翻译成藏语,以双语的形式出版,展现了藏族青年诗人的创作面貌。四川民族出版社还推出了《中国彝族母语诗歌大系》,收录了310位彝族诗人的诗作,展示了彝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活力。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编选了《游动的群山》(诗歌卷),精选蒙古族诗人朝鲁门、萨仁其其格、勒·楚伦等人的优秀诗作,翻译成汉文集结推出,展现了草原诗歌的风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2017年,多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著作涌现。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主题、领域、视角多样丰富,针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场,既有个案剖析,也有对总体问题的论述,其中,刘大先的《千灯互照》针对2006年至2015年少数民族文学年度发展情况进行考察,林琳的《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文学》对新时期以来回族小说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孙诗尧的《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则对锡伯族母语诗歌的发展展开论述。这些著作涉及大量的文学创作资料与作家作品论,尤其关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生态,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与资料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发表阵地多样化,各类文体佳作迭出

想要梳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发表情况,实属不易。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在发表作品时,并不是都发表在民族文学方面的刊物上,所以需要关注全国众多文学刊物;另一方面,即使仅就民族文学领域的刊物而言,也是数不胜数,除了中国作协的《民族文学》,还有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刊物,既有汉语刊物,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母语刊物。作为一个读者和研究者,面对如此庞大的对象,我只能选择自己相对比较熟悉的对象和领域进行言说。

在诗歌方面,《民族文学》所刊载的作品体现了诗人们的多向探索,如何抒写传统,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是少数民族诗人在写作中经常思考的命题。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在《牧牛人》(查刻奇译)中塑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作为“牧牛人”的“父亲”,似乎是整个民族习俗传统的缩影。彝族诗人普驰达岭从彝族典籍《指路经》中汲取养分,创作了诗歌《石头之书》,抒写彝族各个支系的共同祖先和记忆。壮族诗人韦廷信诗作《剪布》中,“阿布”和“布妈”不仅是母子关系的隐喻,同样彰显了诗人试图回归民族性、文化寻根的意图。藏族诗人诺布朗杰的《一把雕花藏刀》、维吾尔族诗人吾斯曼·卡吾力的《家乡的星夜》、羌族诗人雷子的《马鞍戒》、瑶族诗人唐德亮的《红头巾》、锡伯族诗人顾伟的《原点》等也从不同角度书写了对传统文化的思索。

诗歌除了要表达久远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还必须关注当下多元的现实生活。书写现实生活,关注日常生活经验,也成为很多诗人的选择。哈萨克族诗人哈志别克·艾达尔汗在《有人向我提起春天》中抒发对爱情和日常生活的独特体会。回族诗人马永珍在《羊羔舔碎了新月》中,用轻快的语调书写了牧民们的生活细节。土家族诗人冉冉的组诗《夜幕合围之前》、朝鲜族诗人姜孝三的《爷爷的背架子》、满族诗人姜庆乙的组诗《转身》、满族诗人胡卫民的《离乡的月亮》、苗族诗人未末的组诗《在黔之东》、纳西族诗人和克纯的《花语在左,泉音在右》等诗作,或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或书写个体在时代、社会中的独特生命体现,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诗歌的多样性。此外,很多女诗人的诗作中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意识。比如,藏族女诗人康若文琴的《尕里台景语》、维吾尔族女诗人琪蔓古丽·阿吾提的《你为何像鸟羽一样飘落》、彝族诗人鲁娟的《一个阿妈穿过城市》、回族诗人锁桂英的《窑山顶上的那棵树》、满族诗人苏兰朵的《虚构》、满族诗人安然的《盗词人》等作品,或体现女性诗人的细腻、敏感、柔情,或彰显了她们对自我处境和身份的复杂思考。

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方面,亦是佳作迭出。例如,在《民族文学》2017年度获奖作品中,仡佬族作家王华在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中探讨人性的冷漠与救赎;苗族作家代第着冬的小说《口信像古歌流传》用先锋的艺术手法进行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叙事;壮族作家陶丽群的小说《打开一扇窗子》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位于中越边境的村庄发生的故事及其女性家族经验。回族作家阿慧的报告文学《大地的云朵》记录一群中原拾棉工赴新疆务工的故事,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怀。蒙古族作家鲍尔

吉·原野在散文《土离我们还有多远》中书写了对自然、生态等问题的思考与关怀。

2017年,很多刊物采用专号的形式集中推介某一群体。例如,《青海湖》杂志推出了“藏族小说十二家”专号,集中刊发了次仁罗布的《梅朵》、万玛才旦的《赤脚医生》、江洋才让的《天堂隔壁》、尹向东的《世界之外》、扎西才让的《回归文学的老人》、何延华的《围猎》、格绒追美的《幻影三章》、此称的《流亡者》、秋加才仁的《河里的孩子》、永基卓玛的《桑珠和曲珍》、元旦达吉的《公主》和桑杰才让的《雪魂》等作品。这些小说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关注人生、描摹现实,多层次地展示了各民族地区的丰富生活。《佛顶山》杂志推出“少数民族诗人诗歌专号”和“少数民族80后90后诗人诗选”,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少数民族青年诗人的创作活力。

作家队伍梯队合理,共同谱写多彩旋律

这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繁荣发展,这得益于少数民族作家的“数代同堂”。2017年,很多知名作家继续推出自己的佳作。其中,藏族作家阿来推出了短篇小说集《阿古顿巴》和诗集《阿来的诗》,展现了充沛的创作活力。满族作家关仁山的小说《金谷银山》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大背景,展现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北方农村的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回族作家张承志出版了散文集《汗乌拉 我的故乡》,对草原青春进行回首。满族作家赵玫推出了《赵玫自选集》和中篇小说选集《蝴蝶飞》,对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进行阶段性总结。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散文集《声音的替代》中表达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思考。另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生力量不断壮大。在各个文学刊物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80后”、“90后”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方面越来越成熟。

随着创作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作家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书写,试图写出自己的个性。在2017年的阅读中,还有这么几部作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斡尔族作家映岚在长篇小说《雅德根:我的母系我的族》中,以清末至今苏如勤家族数代人的命运为主线,从多个视角反映达斡尔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及生存画卷。瑶族作家陈茂智的长篇小说《金窝窝,银窝窝》以“矿产”为主线,书写大瑶河边两个古老瑶寨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故事。藏族作家道吉多吉在散文集《山神的牧场》中,将自己行走于藏区山水之间的感触付诸笔端。羌族作家羊子在诗集《汶川年代:生长在昆仑》中,表达了汶川、羌族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交融共生、变迁递进的文化图景。回族作家石彦伟的散文集《泰斯比哈》,以文学的笔触全景式地展现了不同地域的中国回族普通人的生活,展示了回族深厚的文化传统。

总之,从2017年的文学发表、出版等情况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展现了充沛的创作活力。在文学生活日益丰富的当下,无论是面向历史与传统,还是立足并关注现实,都成为少数民族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主题,基于这样的话语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数量不断增加,整体的质量也非常高。由于个体阅读的有限性,这篇文章肯定无法充分地呈现这个极度活跃的现场。期待中国多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文学场域内出现更多佳作。

■声音

文学翻译:拆解与重建

哈达奇·刚(蒙古族)

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精心建造的神秘庄园。他在打造这座庄园的时候,有过种种可能、种种架构、种种细节,最后选择了作品里的那些文字,展现在读者面前。面对这座庄园,读者是它的参观者,评论家是它的质检员,去评价它的结构不合理,质量到底如何。可是译者不一样,他不只是一个目行十的普通读者,也不只是个冷眼察阅的质检员,他要成为这座庄园的拆解者和重构者。他要把整个物体拆开来,然后再按照作者提供的架构,在另一个语境下重新建造起来。在重造的时候,既要符合作者原来的构想,又要符合

新语境下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趋向。

一些译者缺乏这种拆解、重构的能力。这是因为他对原作没有完全理解或理解不深,却硬要翻译,结果总是不能够准确译出原作的意境。有的对原作大概了解一些,但并不拆解,而只是在脑子里留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在新语境中按照自己的“想当然”,重新架构一个与原作无关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虽然有原作的大概影子,但实际上却成了译者的作品,如还原成原文,可能与原作相差十万八千里。

文学作品的语言往往是具有双重性的,尤其是诗歌作品中的语言,既有字面意义,又有隐喻在其中。甚至有时候字面意义只是假象、幌子、

伪装,而其内在意义却另有所指。这就需要加以深入理解和把握。原有的双层含义,在另一个语境条件下不一定有完全对等的词汇来替代,这时候尤其考验译者的本领。这时候有的译者可能就不愿意下功夫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流于表面忽略了本质,翻译出来的作品就失去了韵味和意境。

总之,文学翻译是一门科学,需要精益求精,容不得丝毫的粗枝大叶。文学翻译更是一门艺术,需要精雕细刻,需要译者注入精力和情感。让我们每一位译者,都忠于科学,精于艺术,为我国多民族文学翻译事业架起一座座七彩虹桥。

老罗说,西双版纳要看的地方太多了,最值得看的是勐仑葫芦岛上的植物园,规范的名字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老罗是当地人,他说勐仑是傣语,意思指“柔软的地方”。传说当年佛祖走累了,就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坐着坐着感到那石头软软的,非常舒适,就欣慰地将这个歇息过的地方叫作“勐仑”。

西双版纳的每一处地方都活跃着蓬勃的生命,从人到大自然的动物、植物。俗语说,独木难成林,而在西双版纳,独木成林的景观却非天方夜谭。位于省级口岸打洛镇及中缅边境附近,就有一棵高达28米、树龄200多年的大叶榕树,腰间生出密密的气生根,顺着树杆而下,相互交缠,盘根错节;于左右两侧的主枝上,又有几十条气生根垂直扎入泥土,再次钻出大地,发出新芽,造就一棵树干多。那由母树生出的树根像列队的骑士,一排排守卫着母亲,经年累月。

这里的榕树品种繁多,有高榕、薄叶榕、平叶榕、垂叶榕、小果榕、聚果榕、气达榕、枕果榕、金毛榕、黄葛榕等几十种。这些榕树不择土壤,不怕干旱湿热,既可在雨林中、沟谷中茁壮成长,也能在寨边道旁干山梁上枝繁叶茂。而且,在众多的榕树中,有20多种善长所谓“气生根”,就是它们,长成了在热带常见的茂密树帘,还有成片的树林。

气生根旺盛的榕树生出的细根,有的还会飘浮在空气中,初生时细如麻线,飘飘悠悠,宛若拂尘,渐渐找到根基扎实,然后就像一道帘幕挂在树上,粗细不等的树根曲卷,犹如一道飞瀑从高处跌落,被称作“树帘”,或“树瀑布”。

大地母亲给了万物生长的乳汁,无限慈悲地让它们依照自己的天性,在这片土地上尽力生长,尽情绽放。常年气候温热、雨量充沛的西双版纳,本来就是一个天然大植物园,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于上世纪50年代领头创建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更是汇集了天下的奇花异草。在这座我国目前面积最大、植物最丰富的绿色王国里,有12000多种热带植物,保存了大片的热带雨林,共有棕榈园、榕树园、龙血树园、苏铁园、野生蔬菜园、稀有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区等38个专类园区,许多珍稀物种为世人罕见。

走进这绿色的王国,让人目不暇接。

千年的“铁树王”堪称稀世珍宝,3株千年铁树,一雄二雌,是从野外引种而来,还有老茎生花,树杆结果,神秘果、跳舞草、红豆树,各显出不同的生命奇迹。

只见那绿生生的捕蝇草,一瞬间就能合拢叶片,将不幸停留的蝇虫牢牢捕获。开着白色或红色小花的茅膏菜,看上去很漂亮,但其叶片不可以触碰,那些误认为可随意停歇的昆虫,飞上去即刻就会被粘住,再也飞不起来。还有一种瓶子草,瓶型的叶子就像一个个陷阱,昆虫一旦掉落,瞬间就成了它的猎物。类似的食虫植物还有猪笼草、捕虫堇,吸引了一群群好奇的游客。还有一些叫洋名的植物,海伦福拉、达林顿尼亚等,它们来自异国他乡,但跟西双版纳土生的食虫植物有着相同的习性。这些植物本身有叶绿素,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根系极不发达,因此靠捕食昆虫来弥补氮素养分的不足。

神奇的大自然隐藏着无穷奥秘,植物与动物之间,谁比谁的智慧更多,由此看来很难比较。万物生长,相互依存,又相克相生,或许这是宇宙之初就有的法则吧。

植物学家蔡希陶早年毕业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精通英语、德语、拉丁文,在植物分类等专业领域研究精深,他扎根勐仑50年,打磨出这块巨大的绿色翡翠。著名作家徐迟当年在写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后,立刻专程赶往云南采访蔡希陶,陪同他的周明先生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的行程抓得非常紧,因为蔡希陶得了重病住进医院。徐迟和周明先是在昆明医院里采访了蔡先生,接着又奔赴西双版纳,在植物园里住了好些天。徐迟采访了一批曾与蔡希陶并肩工作和劳动的技术员、工人、农民,最后写出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青》。

徐迟先生长期生活在武汉,上个世纪90年代,有幸亲身感受到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提携,还曾得到过先生的赠书,其中就有报告文学集《生命之树常青》。后来我几次搬家,好多书都搬得不见了踪影,但所幸这本《生命之树常青》一直完好保存于书箱里。

走进植物园,不由得想起徐迟先生的笑容,他笔下描绘过的万千植物繁茂鲜活,而他描写的科学家蔡希陶则在这片浓绿的背景下,静静屹立。那是人们为蔡先生所立的雕像,他像一位老农,带领着拓荒者,手抚摸着树木。人们说,这位科学家一生的研究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蔡希陶在仅20岁时,便一人徒步金沙江,进入小凉山采集植物标本1万多号,并发现油瓜引种成功;1955年他在瑞丽的深山里找到了两棵橡胶树,经过嫁接育苗成功,在西双版纳大规模种植橡胶林。他带人乘坐独龙舟,横渡罗梭江进入葫芦岛,用大砍刀在林海中劈荆斩棘,将一片片蛮荒之地建成植物的乐园。蔡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曾豪情奔放地面对罗梭江在勐仑坝子勾出的葫芦形半岛,写下“群峦重重一霍平,万木森森树海行”的诗句。一把锄头、一把带有长柄的芟刀、一顶遮阳避雨的竹帽、一件用白帆布做成的围腰,便是他拓荒的装备。

“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自然界的对象,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条件去奢谈其他辅助条件。”他后来在回顾往昔时这样写道。在葫芦岛上,蔡希陶带着一群人拓荒种植,从三间茅草屋,到苗圃和菜园,再到试验地、标本馆、药物区,几年之后,在勐仑坝子葫芦岛上魔术似的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从国内外引种栽培的3000余种植物在这里生根开花。

“在西双版纳,一屁股坐下就能压倒三棵药草,一打开窗户就可以找到研究课题。”当年,蔡希陶就是用这些最实在的话激励年轻科研人员的。事实正如他所言,植物园不光栽种了几千种植物,还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在大地上书写下“立体文章”:云南茶花、国家急需的天然橡胶、用于石油开采的重要原料“瓜胶豆”以及国产血竭、抗癌植物“姜登木”等。

1981年蔡希陶离开人世,按照他的愿望,他的亲人将他送回到植物园,从此他安睡于自己亲手栽种的那棵龙血树下。如今,蔡先生创建的植物园早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科普基地和旅游景区,目前正在研究的国家重大项目就有900多个,完成项目已达600多项,并与50多个国家有着广泛的交流合作。

当年蔡希陶与徐迟,两位智者的相逢和交谈,共同倾注着对绿色及生命的深切关爱,如今两位智者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徐迟先生以他的作品依然活在人间:蔡希陶先生亲手栽种的那一株株棕榈、贝叶棕、木荷、珙桐、龙血树……青枝绿叶,繁茂旺盛。它们延续着智者的生命,朝着无尽的时空有力伸展。

植物园犹如一块绿宝石,镶嵌在怒江江边,它们相互依偎,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往前只有几公里便是老挝,人们在口岸边穿梭往来,生生不息。

这一天,又逢欢乐的泼水节,道路上赶集的人络绎不绝,傣家人的愉悦就像热带迅速生长的植物,浓密而又昂扬。穿着筒裙的姑娘,傣语叫“晴哆哩”的妙龄少女,扭动着细腰,高耸的发髻旁插着一朵芍药花,或是一根长长吊坠的银簪子,三三两两地穿过树林。她们担着水,那水桶也仿佛是为少女的婀娜特制的配饰,一前一后随着行走而俏皮地晃动,步子稍快时,桶沿便溅出一点点细碎的银色水滴,就像盛开在少女脚下的一朵朵小花。当地人称“晴哆哩”的小伙子,早早地藏在路旁的绿树后边,大叫一声跳出来,吓唬一下姑娘们。在欢庆的村寨里,漂亮的傣家姑娘和小伙聚集在一起,跳起各种节庆舞蹈,然后开始泼水。

起初,我也兴奋地参与到他们的行列里,但不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一个个如花似玉的“晴哆哩”举起小盆,用力将水朝人的头顶泼去,三两下便把人浇得透湿。姑娘们兴奋地嬉闹,在小伙子们的围攻下毫不示弱。他们站在水塘里,排成两个对峙的阵营,用盆、用手,甚至用脚,将水泼起来,激荡起来,满天都是水花,到处都是欢笑。小伙子大多手下留情,乐意被姑娘们泼成落汤鸡,假装溃不成军,噢嚷直叫,姑娘们则越加使劲地将一盆盆清水劈头盖脑地泼去。

青春的召唤,旺盛的活力。在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生命之树长青。

万物生长
□叶梅